

## 傳播學門的再思考： 口傳與大傳的分立史與整合路\*

游梓翔、夏春祥\*\*

### 《摘要》

受到西方傳播學界整合趨勢的影響，華人傳播學者對整合「口語傳播」與「大眾傳播」成為單一的傳播學門已漸具共識，雖然在整合方式上仍意見分歧。有別於「口傳棄口語、大傳棄大眾」，共同向傳播靠攏的「平行整合」建議，本文以 Dance 及 Knapp 的理論為基礎，提倡依「種系發生」與「個體發生」的兩條時間軸線，透過「口傳先大傳後」、「口傳體大傳用」的模式來進行傳播學門的「垂直整合」。作者也建議了整合後口傳與大傳的四種對話可能。

關鍵詞：口語傳播、大眾傳播、科際整合、傳播學門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所提供的修改意見，以及劉文英、溫偉群兩位教授在論文撰寫過程中給予的大力協助。

\*\* 游梓翔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Email: tyu@cc.shu.edu.tw  
夏春祥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hhsia@cc.shu.edu.tw

## 壹、前言：整合的趨勢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美國的傳播學界開始出現一股「整合」風潮。原本分屬獨立科系的「口語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後簡稱「口傳」)與「大眾傳播」(mass communication，後簡稱「大傳」)，因為分享了「傳播」的名銜，在許多大學逐漸被統合為以「傳播」系或「傳播」學院。於是多年來口傳與大傳「一個『傳播』，各自表述」的「名統實獨」現象逐漸畫下句點，一個新而統一的「傳播學門」正在成形(O'Keefe, 1993)。而對於傳播學深受美國影響的台灣，這樣的整合趨勢也受到了學界的注目(陳世敏，1999)。

整合的立即效果是將原本個別計算的師生人數得以加總起來，比起口傳和大傳的單打獨鬥，這個新的傳播學門更有能力與其他社會科學學門競爭校內外資源。伊利諾大學教授 O'Keefe (1993: 80) 便直言，「經由整合，各傳播學門可以互相支援，使得傳播領域成為校園中更大的單位，進而確保傳播科系人事的穩定性與安全性」。不過，「外患」問題雖然獲得了改善，但「內憂」問題卻可能因此惡化。名統實獨的口傳與大傳原本就有各自的定位爭議，當愈來愈多學術背景與專業興趣迥異的師生齊聚在「傳播」的大傘下時，當為了求取最大公約數，傳播學門的定位將更加模糊失焦。可能的結果是：當什麼都是傳播，而傳播又什麼都是時，傳播學門將無法找到獨特的概念區隔，於是變得什麼都不是了。

許多傳播學者也針對傳播學門的定位問題表達了他們的憂慮。例如國際傳播協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ICA) 前任主席 Wartella (1994: 55) 便批評傳播學者「缺乏明確的自我認識」。伊利諾大學教授 Swanson (1993: 169) 表示，「傳播學不是一個學門」，因為傳播學是許多次領域「在政治上而非知識上的結合」。國家傳播協會(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NCA) 前任主席 Zarefsky

(1993) 則呼籲傳播學者應該致力為三項定位問題找尋答案：

- (1) 傳播學門的特質為何？
- (2) 傳播學門的核心議題或組織原則為何？
- (3) 傳播學門的存在價值為何？

延續 Zarefsky 的觀點，香港浸會大學的 Powers (1995) 認為要處理傳播學門的定位問題，必須「界定」(specify) 整合傳播學門的核心概念並「說明」(articulate) 為何選擇這些概念，而且傳播學門的定位既要能「包容」(include) 現有的多元研究教學興趣，也要能「呈現」(reveal) 傳播學門各個組成部分的系統相關性。只有滿足 Powers 強調的四項條件，這個由口傳與大傳共組出來的傳播學門才能從形式與利益的「烏合」走向學術概念上「整合」；而也唯有在這個概念的整合基礎上，傳播學門的存在價值才得以建立。

在從概念上整合口傳與大傳的各項提議中，獲得最多支持的是一種我們稱之為「平行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 的提議。支持平行整合的學者相信，口傳與大傳之間已無法清楚畫出界限，因此他們建議「口傳應該捨棄『口語』、大傳應該捨棄『大眾』，兩者共同向『傳播』靠攏」。

如果平行整合意味著未來不再有口傳與大傳學者，只有傳播學者，不僅忽略了這兩大團體在學術背景與研究興趣上的長期差異，也等於是拋棄了他們在歷史傳統與學術定位上的獨特價值。套用 Powers 的標準，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或許做到了「界定」，卻無法有力「說明」，或許做到了「包容」，卻無法有效「呈現」。首先，透過找到口傳與大傳的最大公約數，新的傳播學門不難「界定」出一個具有較高的抽象層次 (level of abstraction)，可以涵蓋原有口傳與大傳的核心概念。例如 Zarefsky (1993: 2) 便建議以研究「訊息與人的關係」作為傳播學門的核心；而陳世敏 (2002: 82) 則主張以「意義是如何形成的？」作為學門的核心問題。

不過，也正由於這些概念抽象性過高，往往犧牲了獨特性，這使傳播在概念上成爲一個無所不包，難以與其他領域區隔的學門。由於人類

文明基本上都是符號產物，不僅牽涉到人，也牽涉到意義的分享，如果傳播研究的是「訊息與人的關係」，那麼什麼不是傳播呢？如果文學、藝術、歷史、建築、工業設計都有可能是傳播，為何在應用課程上，傳播科系卻獨愛演講學、採訪寫作一類的科目，而沒有建築設計或藝術創作的課程？我們認為，要有效「說明」傳播是個怎樣的學問，不僅需要畫界的抽象概念，更需要具有獨特性的具體「核心」(cores)。這也就是堪薩斯大學教授 Shepherd (1993: 83) 所說傳播學成爲一個學門必須具備自己的「本體觀點」(views of being)。

其次，透過類似「訊息與人的關係」這樣的抽象概念，這個整合出來的傳播學門當然可以「包容」原有口傳與大傳的多元研究教學興趣——甚至包括許多原本超出口傳與大傳傳統研究範圍的興趣。不過，在這個傳播的大宅門內，口傳與大傳這兩個成員間的關係卻不會因爲宅門擴大、人丁興旺而獲得提升。如果口傳與大傳共處一室的原因只是因爲兩者分享了傳播的「last name」，那麼統合出來的傳播學門將只是「貌合」而非「神合」，「烏合」而非「整合」，無法做到 Powers 所說的「呈現」系統連貫性。

我們相信，如果採納「平行整合」建議，將可能顧了「界定」而失了「說明」，顧了「包容」而失了「呈現」，更加惡化 Wartella 所說的自我認識危機。透過這篇論文，我們希望針對傳播學門的統合的大趨勢，提出一項「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建議。這項建議的具體方向有三：首先我們將以「言談」以及「媒介」的核心概念分別爲口傳與大傳定位；其次我們建議言談及媒介的兩個核心應以時間爲軸線來展現概念連貫性；最後則是口傳與大傳應該透過言談及媒介的核心進行對話交流。

## 貳、口傳的定位問題

在探討定位問題時，本文將先討論口語傳播，再討論大眾傳播，這

與一般將傳播研究等同於大眾傳播，忽略口語傳播的看法不同。但就如同台灣傳播學界前輩陳世敏 (2000: 6) 所描述的：「語言傳播這部分一向是美國傳播學教育的傳統，大眾傳播只能屈居小老弟」。就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將先討論口傳的定位，再探討大傳的定位。

熟悉傳播學門發展歷史的人都知道，口傳這個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創建，承襲了古希臘語藝傳統的學門，近百年來一直面對著自我定位的爭議。具有口傳背景的中興大學教授曹定人 (1991: 152) 表示，口傳「對於沒有直接投身其中的人士卻仍是個謎」；她發表這項評論的理由很簡單，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找到定位，遑論學門外的人士呢？

定位爭議的劇烈可以從口傳專業學會在百年內使用了四個名稱的現象上看出來——1914 年創立時的「全國演講教師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cademic Teachers of Public Speaking, 簡稱 NAATPS) 用了 32 年，1946 年更名而成的「美國口語學會」(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簡稱 SAA) 用了 24 年，1970 年的「口語傳播學會」(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簡稱 SCA) 用了 27 年，在 1997 年的又被改為「全國傳播學會」(NCA)，幾乎是每四分之一個世紀就會改名一次。有關口傳定位的爭議與兩項焦點有關：(1) 口傳是否要模糊與大傳之間的界線，以及 (2) 口傳是否要拋棄「口語」的核心。

關於第一項模糊於大傳之間界線的問題，近年來在口傳學者間已經取得了較高的共識。在 1997 年的 SCA 年會前，為了尋求會員對改名的支持，時任主席的 Chesebro (1996) 使用的兩項理由之一就是拿掉「口語」而留下「傳播」有助於包容學會中日益增加的大傳學者。這也就是為什麼黃鈴媚 (1999) 會認為改名是口傳對大傳的一項「化敵為友」舉動。

但關於第二項爭議，口傳學者不僅欠缺共識，還形成了「擁口語」與「去口語」的兩個派別。「擁口語」派的支持者相信，在學科邁向更完備發展的過程中，不必因此拋棄口語核心，這一派的人數雖然缺乏正式統計，但從 1997 年 NCA 年會在一片包容大傳的聲音中，仍有高達 31% 的會員投票反對更動 SCA 名稱的數字看來，可能也不在少數

(Membership changes name, 1997)。但佔據上風的仍是「去口語」派，許多學校的口語傳播系在即使校內另有大眾傳播系的情況下，仍然甘冒造成混淆的情況下改名為「傳播」或「傳播研究」系，說明了「去口語」派在美國已獲得愈來愈多的支持。

雖然華人傳播學界一向為美國馬首是瞻，這意味著「去口語」派在華人世界也很可能將獲得優勢，但我們認為，對口傳學門的定位而言，拋棄「口語」的核心將是個弊大於利、自失立場的。

### 一、如果不是「口」傳，那麼口傳是什麼？

在「去口語」運動風起雲湧以前，美國的口傳學門雖然定位爭議不斷，但大致上仍奉「口語」為核心。自1914年一群大學教師脫離了英語系獨立的時期開始，口傳學門就自許為一個研究「口語」，兼顧理論與應用的學門 (Cohen, 1994; Delia, 1987)。馬成龍 (1999: 249) 形容這是一個「舉凡與用嘴有關，從人文到科學無所不包的學術領域」。簡單地說，就是一門「話」學。即使在半世紀後集合了多位重量級學者召開的紐奧爾良會議中，與會人士仍達成了口傳「是傳播學重要分支」，其研究焦點是「口語符號互動」(spoken symbolic interaction) 的決議 (Kibler & Barker, 1969)。到這時為止，五十年來，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口傳當然就是「口」傳。

然而，近二十年來，愈來愈多人排斥口傳中的「口」，認為「口語」是個過時的觀念，時至今日，「去口語」運動已經對美國的口傳學門造成了重大影響，而可以預見的，這股風潮也將漂洋過海而來，影響華人口傳學門的發展。

#### (一) 美國口傳學門「去口語化」的結果

至少在名稱與概念的層次上，美國相當數量的傳統口傳科系已經完成了「去口語化」——捨棄了「口語」，正名為「傳播」。主張正名者又可以分為兩大派別：持「通吃」觀點者認為口語侷限了傳播的範圍，除

了口語之外，傳播研究還應該將各種傳播形式包含在內，例如 Zarefsky (1993: 107) 便表示「口語已不再是此一領域的界定特質。在我們參與的多數傳播都是透過媒介進行的時代中，我很難看出口語的獨特性」；持「丟棄」觀點者則認為口語缺乏學術深度，只是口才交際溝通技巧一類的技術培養，欠缺通識性與學術性，應該加以放棄。

有趣的是，在這些傳統口傳科系中，只有極少數確實做到了「口惠而實『也』至」；在設計專業應用課程時，採用與概念層次一致的做法，對各類傳播技術大小「通吃」，或是將口語類技術課程完全「丟棄」。但它們多數是屬於「口惠而實不至」的類型——在概念上鄙夷口語，但在設計專業應用課程時，一方面沒有能力「通吃」所有傳播技能（如寫作學、服裝學、繪畫學……），二方面沒有勇氣「丟棄」長期作為口傳系賣點的口才（例如演講學、辯論學，甚至正音學）和交際（例如人際相處、聽說技巧）等「基本課程」（basic courses）。

於是一種在名稱與概念上拒絕「口」傳，卻在基礎課程上接納口傳的怪現象便出現了——「我們不是口語專家，但演講課歸我；我們研究所有傳播，但作文課歸你」，成了只有美國的部分口傳學者才聽得懂的說法。這種名與實的落差使得許多科系擔任教學助理的博士班學生，在完全沒有受過口語訓練的狀況下成為口語應用課程的老師，其誤人子弟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或許正因為這種名實不符令人難以理解，雖然「去口語化」喊得震天甲響，但對許多學術界人士而言，口傳還是「口」傳。例如著名的英國哲學與語藝學家 Toulmin (1990: 187) 便這麼描述他所觀察到的美國口傳系：「許多美國大學院校都有以傳播研究或口語為名的科系。這些科系負責指導大學辯論隊，不過老師們也會針對口語傳播及辯論的各種層面進行嚴肅的研究」。

對於弄清楚口傳已經不是「口語」傳播，而是「傳播」的人而言，「去口語化」運動的支持者相信這個學門的學術與通識地位將可獲得提升。不過，如果要將 1968 年紐奧爾良會議決議的「口語符號互動」拉

升為範圍更廣的「符號互動」，口傳學門將會立即發生與符號學、語言學、社會學等傳統學門相區隔的困難。更可能的狀況是，去口語後的「傳播」科系將更難於大傳作區分，因此被誤解為是以媒介為核心的科系。由美國多數傳播系都會對有意申請者強調自己不是大傳或新聞系的做法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誤會的高度可能。

## (二) 兩岸口傳學門「去口語化」的可能結果

在美國的口傳學門出現「去口語化」運動後，這股風潮隨即渡海而來，影響了兩岸華人口傳學門的發展。我們相信，兩岸的口傳學門如果「去口語化」，恐怕將造成比美國更負面的後果。這主要是因為兩項理由：首先，兩岸並不存在著西方的語藝傳統，這是「基礎薄弱」；其次，兩岸的口傳科系在數量上遠遠地落在大傳科系後面（兩岸即使是名為「傳播」的科系，多數也明顯向大傳傾斜），這是「勢力不均」。基礎薄弱加上勢力不均，兩岸的口傳學門如果進行「去口語化」，等於是「去口傳化」，口傳學門的本身特色將遭到稀釋淹沒。

其實，說兩岸存在著口傳學門是十分勉強的。雖然有部分傳播科系包含少數的口傳相關課程與師資，例如北京廣播學院的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吉林師範大學的廣播學院、香港浸會大學傳播系以及台灣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但完全繼承西方口傳學門傳統的科系只有世新大學口語傳播系一個。加上分散在大傳科系的零星口傳「單兵」，這個口傳學門可說是勢單力孤。

但即使如此，兩岸口傳學門仍緊扣著口語的核心。以台灣為例，擁有口傳博士學位的趙怡（1988）這樣介紹口傳學門：「近二、三十年來，西方的學術界人士，以源自古希臘的修辭學文獻為基礎，致力於人類傳播行為的研究，成果斐然。他們把大眾傳播範疇外的資料彙集整合，建立起『語言傳播』（speech communication）或稱為『傳播藝術』（communication arts）的獨立學科」，他並強調「說話與演說的技巧是其主要的研究領域」（頁 11）。1992 年設立的世新大學口傳系，十年來也始



終以「口語」為研究教學的核心，在向教育部申請設立新系的計畫書中，該系的創系者這麼寫道：「語言傳播在人類傳播行為中佔極重要地位，在現代化的台灣，政治步上民主化，具有口語溝通及演講辯論、談判說服等人才已極為迫切需要。」而在大陸，由吉林師範大學演講學教授邵守義等人創立的《演講與口才》雜誌，在推廣口語研究上成效卓著。

由此可見，兩岸的口傳學門先驅正努力以不到二十年的時間，建立西方花了半個世紀，才在語藝理論的多年基礎上建立的口語傳統。在打著「口語」大旗向學界及社會推廣的當口上，如果忽然定位轉向，來個「去口語化」，可能在新的形象建立以前就落得前功盡棄的後果。一下是「口」傳，一下又不是「口」傳，誰能弄懂？現任世新大學口傳系主任的黃鈴媚（1998: 16）感嘆：「……知道這個科系的人愈來愈多，其中卻包括許多誤解這個科系的人」。我們認為，許多的誤解其實是來自這個學門在自我定位上的模糊不清。

## 二、如果是「口」傳，那麼口傳是什麼？

在定位問題上，我們認為口傳學門應該繼續保有「口語」的核心。在這裡我們所說的口語與傳播學者 Dance<sup>(1)</sup>（1982）所說的「口說語言」（spoken language）類似，是人類天生的「口說」能力與後天的「語言」環境結合下的產物。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的 Knapp<sup>(2)</sup>（1989: 148）在為《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的「口語」（speech）詞條撰文時對此作了最佳的註腳：「對許多學者而言，人類將發聲與語言符號相結合的獨特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產生了與兩種過程各自存在時非常不同的結果」。

### （一）言談作為口傳學門的核心概念

雖然認同以 Dance 與 Knapp 界定的口語為核心，但我們也同意 Chesebro（1996）的看法，認為代表口語的「speech」容易與「演講」相混淆，因此我們建議改用「talk」，即中文的「言談」，因此口傳學門就

是一個以人類的言談為核心概念的學科。而我們相信，口傳學門的此種界定方式將可以為它建立起足夠的可辨性、重要性、獨特性與延展性，從而回應學術正當性的可能挑戰。

首先，言談的概念具有足夠的「可辨性」(distinguishability)。這個概念在人文社科著述中相當常見，例如喬治城大學語言學家 Tannen (1996) 多年來的研究焦點便是兩性之間的言談風格差異。英國蘭卡斯特大學著名的社會語言學家 Boden (1994: 1) 在她的《言談商業》一書中也說：「言談是所有組織的核心。透過言談，我們每日的組織與商業活動才得以完成。組織中的個人整天、每天都在談話」。雖然語言學家多半偏好使用「談話分析」的單一方法來研究言談，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經常不如口傳學者廣泛，但這至少說明了言談是可以有效區辨出來的現象。

不過，以言談為核心並不表示對於言談以外的事項全然不顧。Knapp (1989: 147) 告訴我們，研究口語的人「關心的是人類透過口說語言及輔助口語的其他非語言行為所進行的傳播」。對口傳而言，言談被放在中心位置，但言談週邊影響言談的因素與現象，仍舊是口傳學者關切的主題。

其次，我們認為言談是具有「重要性」(significance) 的，無論在量的方面還是質的方面。就量而言，言談是人類最常用但卻較少被研究的傳播形式 (Nichols & Stevens, 1957)，密西根州立大學的 Miller (1966: 2) 強調「人類參與大量的口語論述的事實說明了口語傳播的核心地位」。就質而言，言談是區分人類與其他物種最關鍵的特質，Dance (1989: 4) 指出「口語是人類傳播的精髓——從發展與社會的角度而言，口語都是使傳播成為獨特人類傳播的關鍵因素」。

第三，以言談為核心有助建立口傳學門的「獨特性」(uniqueness)，二十世紀初期口傳學門就是因為口語在英語系受到忽視而誕生，至今除了口傳學門以外，學界並沒有第二個學門選擇以言談為核心。我們認為，這個獨特的核心將因為「去口語化」而消失。正當美國的口傳學門

爲了是否「去口語化」而爭議不休時，語言學與文學界卻正展開一場 Toulmin (1990: 186) 所謂的「返回口語」(return to oral) 的運動，他說「語言與文學學者在近二十年內重拾對口語、溝通、語藝與言說的關心是十分明顯的」。換句話說，當初人家忽視而我們緊抱的東西，現在竟成了我們不要而人家要回去的東西了。

最後，言談具有學術研究上的「延展性」(extensiveness)。Knapp (1989: 147) 認爲口傳的研究重點包括「製作口語傳播訊息的認知過程、訊息本身、訊息是否能達成實際的說服與人際關係效果，以及口語傳播發生的文化、心理與物理情境等問題」。除此之外，口傳學者還有多元的探究言談現象的角度，他們可以應用社會科學或歷史批判的方法、針對修辭說服與溝通協調的言談目的，探究言談要素間的關係，如言談者、言談文本、言談情境等。

## (二) 公共與私人言談作為口傳學門的主要研究方向

參酌口傳學門的發展歷史，這個學門如果要選擇以言談爲核心概念，那麼它最主要的研究方向將可分爲公共言談與私人言談兩大方面。

首先，所謂「公共言談」(public talk) 的研究方向關切的是公共領域的各種言談的構思、布局、發表與影響。公共言談的研究方向自口傳在美國創設之初就是這個學門的核心。當時口傳先驅以古希臘的語藝研究爲師，將口傳的研究教學重心放在公共言論 (public address) 與演講辯論原則技巧的批評與探究上。爲了避免走上十七世紀歐洲語藝的「發表學派」(elocutionists) 只重聲音與肢體訓練的老路，學者們將語藝的與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在公共言談研究裡，希望建立其學術地位 (Rarig & Greaves, 1954)。以人文的語藝批評方法爲主要研究取徑的公共言談研究一般稱爲「語藝研究」(rhetorical studies)，以科學的實驗調查方法爲取徑的公共言談研究則稱爲「說服研究」(persuasive studies)。

其次，所謂「私人言談」(private talk) 的研究方向關切的是私人領域言談的原理原則，簡單地說，就是透過言談來處理自己與自己以及自

己與他人的關係。雖然口傳學門是到了二十世紀中期才廣泛體認到私人言談的重要，但其實早在學門創設之初，部分先驅者便已有這樣的遠見。例如NAATPS的首任主席歐尼 O' Neill 與 1927 年主席 Weaver (1933: v) 合著的《口語要素》一書中，便強調「本書並非只討論演講，它關心的是口語的全部功能，包括私人的口語與公共的口語在內」。他們雖然早有此一願景，但私人言談研究的蓬勃是在二次戰後社會學與心理學的研究被廣泛引進口傳學門後才開始，這時人際對話 (conversation) 與團體討論 (discussion) 等私人言談形式受到矚目，後來逐漸發展為自我傳播、人際傳播、團體傳播、組織傳播等領域，在部分口傳科系中，私人言談研究的重要性甚至凌駕在公共言談之上 (Knapp, 1989)。

我們認為，以言談為核心的口傳學門將可以透過公共言談與私人言談的兩大研究方向在學術界建立自己的獨特定位。

### 參、大傳的定位問題

相較於口傳的定位紛爭，無論從研究方向、教學內容、學生就業、社會觀感等各種指標來看，若要說大傳是一個以「媒介」(media) 為核心的學門，爭議是比較小的。

首先，許多以傳播或大眾傳播為名的研究與教學，長時間以來都是以媒介通道做為科系之間劃分的主要界線；其次，對整個傳播學門發展有著深遠影響的許多歐、美學者，如美國的 Park (1864-1944)、英國的 Williams (1921-1988)、與德國的 Habermas (1929-) 等人，在探討傳統上被認為是大傳相關問題，例如新傳播科技所帶來的社會與文化現象時，更傾向於用「媒介」來表示這些新科技的物質形式與在邏輯上的抽象關係。另外，以「媒介」為核心還為大傳學門帶來了一項好處：學生在媒介產業中的就業優勢，這使大傳在許多國家的大學中，無論在主修人數或科系排名方面都佔據了有利地位<sup>(3)</sup>。

但即使如此，在大傳的發展歷史上，還是有其他核心概念與「媒介」相抗衡。在美國，大傳學門的早期發展與新聞教育密不可分<sup>(4)</sup>，例如 Chaffee 與 Rogers (1997:138) 在討論新聞學院歷史時便寫道：「藉著在新聞學院中教授全世界第一個大眾傳播的博士課程<sup>(5)</sup>，Schramm 建立起在大學裡進行大眾傳播研究的普遍模式」。因此，定位大傳學門首先要釐清「新聞」與大傳的關係。

### 一、是新聞，還是大傳？

基本上，新聞之所以與傳播有著藕斷絲連、難以釐清的關係，在於現實發展中的因緣巧合 (Rogers, 1994; Chaffee and Rogers, 1997; Carey, 2000)。在大眾傳播這個名詞尚未受到廣泛關注前，美國各大學已開始設立新聞學方面的課程<sup>(6)</sup>，用以回應社會中越來越蓬勃發展的新聞事業。

被認為是新聞教育創始人之一的 Bleyer (1873-1935)<sup>(7)</sup> 在新聞學發展初始便希望透過大學的新聞教育，來使得新聞記者不僅知道如何寫新聞，更可以理解他們所報導的那些事件由以生成的社會。從今天的現況來看，大傳學門在發展初期是以「新聞」為核心的。不過為了深化新聞從業人員的訓練，更為了讓新聞教育能被研究型的傳統大學接受，有些早期的新聞學者們便開始倡導社會科學訓練對於新聞實務的價值<sup>(8)</sup>。也因此，涵蓋範圍更廣、對於現實描述也更為貼切的「大眾傳播」遂日漸普及。

不過證據顯示，大傳與新聞的密切關係其實是偶然的。Rogers 在為傳播研究治史時指出，被公認為美國大傳學門創建者的 Schramm，在開始其研究生涯時，是以文學教授的身份進行創意寫作的訓練與教授，而非對新聞情有獨鍾 (Chaffee and Rogers, 1997)。而真正建立起關於傳播研究的想法，則是在二次大戰期間 Schramm 到華盛頓為聯邦政府工作的經驗。其時，一些因為戰爭而匯集到華盛頓的學者們<sup>(9)</sup> 經常聚集在美國國會大廈圖書館，共同討論如何向美國民眾傳遞訊息，以鼓

舞國內的民心士氣，並決定宣傳機構要使用什麼樣的傳播通道來影響某些價值觀。一個曾經參與討論的學者 David Manning White 就描述「大眾傳播研究始於 1942 年的國會圖書館」(Cartier, 1988:171)。

戰後的 1943 年，Schramm 回到愛荷華大學時，面對了兩個工作機會，一是去接替新聞學院院長，二是去擔任圖書館館長<sup>(10)</sup>，最後他選擇了前者。Rogers (1994: 17) 於是假設，如果當初 Schramm 接受的是圖書館長職位的話，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傳播學可能就會以圖書館與資訊科學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為源頭了。此外，Schramm 最初的構想是在社會、心理或是政治學系開設傳播相關的博士研究課程，但由於他畢業於英文系的人文學位背景，使得這條路徑受到阻礙。於是在這樣的因緣際會下，新聞學院便成了大傳或傳播研究發展的基地。新聞透過大傳獲得了社會科學的地位，大傳也透過新聞取得了實務的舞台，這樣的關係一直延續至今。

然而，新聞與大傳之間的互動也存在著高度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關係一方面是因為實務界對於學校新聞教育有著專業上高度但模糊的期待，經常看輕大傳研究；二方面則是許多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大傳學者，對實務導向的新聞訓練興趣缺缺。這種新的與舊的、學術與實務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發展成所謂「綠色遮光罩人」(Green-eyeshades)<sup>(11)</sup> 與「卡方人」(the Chi-Squares)<sup>(12)</sup> 這兩個相互貶抑對方的名詞 (Lovell, 1987:23)。Schramm 希望培養的是運用科學方法從事大傳研究的卡方人，在許多方面都與實務出身的「綠色遮光罩人」的學者們格格不入<sup>(13)</sup>；甚至與贊同科學訓練價值的 Bleyer 也有所不同<sup>(14)</sup>。但是，就如同 Rogers 的觀察一樣，「……在新聞學院，具有傳播學博士學位的年輕學者逐漸地贏得了這場知識革命」(Rogers, 1994: 462)。其關鍵原因當然是現代大學對於學術性的重視遠超過實務訓練<sup>(15)</sup>。

我們認為，在大傳學門作為一門新興社會科學的蓬勃發展下，實務導向的「新聞」已經不足以作為其核心概念。在今日的大傳科系中，所關心的問題早已遠超過新聞的範圍，而且新聞作為一種專業，並不足以

滿足大傳學門與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傳統學門在概念上區隔的需要。

不過，大傳學者也不應該因此就貶抑或拋棄「新聞」。「新聞」源於現代大眾社會形成後對於訊息的集體需求；做為一種產業，它是每一個社會中各類訊息的專業提供者；做為一種文化或觀念，新聞更是社會中各種意義的主要詮釋人、提供者。誠如 McQuail (2000: 337) 在討論新聞的價值時所指出的：「對於各種表述的文化形式來說，新聞是大眾媒介少數幾個具有獨創性的的貢獻之一」。因此「新聞」縱使不是核心，仍然是大傳現象中極為關鍵的部分。只是在研究新聞以及其他大傳現象時，大傳學者必須比單純的實務考量更重視「科學」趨向，這原本應該是更有助於了解新聞現象的。因此至少在理論上，「卡方人」與「綠色遮光罩人」應該是友非敵。更何況近年來大傳學者已經從 Lazarsfeld 所謂獨尊量化研究資料的「行政學派」傾向，逐漸轉化為並重行政與批判、科學與人文、思考與實務的多元觀點 (陳韜文, 1999; 夏春祥, 2002) ; 而精確新聞報導等結合科學量化數據的報導方式，現在也已成爲新聞專業人士的重要傳統之一；「卡方人」與「綠色遮光罩人」兩者之間的界線正在模糊之中。一言以蔽之，他們都是傳播從業者。

## 二、如果不是新聞，那麼大傳是什麼？

可惜的是，「卡方人」與「綠色遮光罩人」原本應該發展的對話關係，在許多大傳學系中卻成爲一種對抗。從 1940 年代開始，兩個團體之間的爭議，便一直持續著，雖然在新聞學院的資源分配上，已經由受過學術訓練的學者逐步取得優勢，但是一直到 1980 年代末期，仍有未曾止息的筆戰，不斷對於現實進行反省。一篇名爲〈卡方人的凱旋：一場徒有其名的勝利〉揭開了這論戰的序幕，作者以強烈的語句寫道：「在純粹的新聞研究中，缺乏對現實可能有用的主題是很大的敗筆……」。新聞學中，在學術研究與新聞實踐之間始終有著明顯的差距。《新聞學季刊》(Journalism Quarterly) 的作者們稱其爲『斷裂』，我卻認爲這是個恥辱」(Lovell, 1987: 23)。不少重學術而輕實務的大傳學者將新聞專業

訓練棄之如敝屣，所任教的單位卻仍然保有「新聞」的名稱，形成了相當奇特的現象。

如果新聞與大傳學院真的致力朝向社會系、心理系一樣的學術型科系發展，大可以完全拋棄新聞專業訓練，不必名實不符地繼續享有因為與專業領域結合而獲得的招生競爭力，但情況並非如此。

在以〈卡方人的反擊：學術研究呈現機會，而非威脅〉為名的系列回應文章中，許多學者強調，學術研究不必然等同於拋棄實務經驗，例如「幾乎在每一個卡方人的心中，都潛伏著隱性新聞記者的趨勢。在加入大學的學院之前，每個人都有新聞記者的遺傳因子」(Alexander, 1988: 31)。這樣的立場和我們是一致的，大傳學術與新聞實務不是對抗的關係，而是對話的關係，兩者都是傳播學門未來發展不可缺少的一塊拼圖。

我們相信，要將大傳學術與新聞實務串聯起來，「媒介」(media) 是一個非常適當的核心概念。所謂「媒介」，按照 O'Sullivan 等人 (1994: 176) 的說法，可以由廣義與狹義角度來下定義，在廣義方面，媒介指的是「任何促使傳播發生的中介工具」；但在狹義方面，媒介則指「擴展傳播的通路、範圍與速度的科技發展」，而此點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力調整，形成科層組織的內涵，「媒體」一詞因此是更加合適的詞彙。我們認為狹義的媒介概念——媒體，具有足夠的可辨性、重要性、獨特性與延展性，可以作為大傳學門的核心。

首先，大傳學門以媒介核心是具有與可以與其它學門明顯區隔的能力的。例如美國與台灣各大學多數的大傳科系都是以「媒介類型」作為科系名稱，例如廣告、廣播、電視、電影、數位多媒體等。用媒介產業作為名稱來囊括相關的學術研究，既彰顯了大傳科系與其他學術領域的不同，也保留了新聞學院時期對於實務工作的強烈取向，成為大傳學門的一項特色與競爭優勢。

其次，媒介做為大傳學門的核心概念具有足夠的重要性，很少人會否認其對社會發展與變遷的重要影響。例如芝加哥學派 (Chicago School) 很早便注意到媒介在整合社會各部份成為一個整體方面的積



極價值；其時，美國正接受大量的移民，這些來自於不同國家的人民，常常各自聚集，用自己的語言，出版自己的報紙，繼而形成很多社會中的摩擦與衝突，並與主流文化隔離。因此，政府常常會壓抑這些報紙。Park 卻主張不應壓抑，而是應該接觸並培養這些移民報紙，藉由移民閱報習慣的培養，既可使移民的情緒穩定，減少都市中的社會問題，更可使移民們藉著報紙媒體接觸到美國人的真實生活，繼而在「老遺產中培養新忠誠」(Park, 1922:468)，使移民順利融入美國的社會。

而在英國伯明罕文化研究中心的 Williams，以及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 Habermas 等人筆下，我們也見到了對於媒介文化意涵的深刻觀察，更重要的是傳播研究透過媒介，開啓了極大的發展縱深。大傳學門以媒介為核心，也因而具有足夠的獨特性。

在今日的學術界中，只要想到媒介就會想到大傳學門，並沒有第二個科系是以媒介為核心的。特別是在 Innis 與 McLuhan 的科技決定論獲得廣泛注意之後，媒介的概念獨特性被更穩固的建立了 (Rogers, 1994)。他們獨特地將大眾媒體的歷史看成是整個文明史的中心；不僅是將媒體看成是社會的技術附屬品，而且看做是社會結構至關重要的決定性因素。對於他們來說，大眾媒介的歷史不僅是歷史研究的另一條路徑，而且是書寫西方文明史的另一種方法 (Carey, 1989)。而在他們之後，媒介的重要性已普遍被認識到。不管是美國、歐洲，甚或是亞洲等地，許多研究大眾傳播的學者都開始以更為抽象的「媒介」視野，來掌握從印刷機、電報、廣播電影、電視以致於電腦、網路等的傳播研究。Curran (2002) 便從媒介討論英國社會在這三百年來的變化。

最後，大傳學門以媒介為核心具有足夠的延展性。媒介研究既可以从多種學術取徑出發，包括了行政取向下的效果研究，以及批判傳統下的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所能探討的現象也相當多元 (Schramm, 1997)。美國文化取向的媒介史研究者 Czitrom (1982: 184) 便曾寫道：「媒介」一詞所隱含的多種意義，頗足以說明所有現代傳播媒介歷史為何包含著語言的矛盾成分在內。因為每一個媒介都是一個「百納袋」，匯集了制

度的發展、大眾的反應，以及應當被當作辯證張力產物的文化內容，同時更匯集了各種反對力量與趨勢，歷經衝突與演化不斷遭遇橫逆。

總之，我們主張以「媒介」作為大傳學門的核心，作為大傳學術研究與新聞實務研究對話的一個包容概念。就像 Czitrom (1982) 在討論社區與傳播的關係時所指出的，雖然早期已有不少學者對影響巨大的媒介有所關注，但卻是十九世紀末新聞事業的演變，才使學者將焦點轉移到傳播之上。我們可以說：沒有新聞，就沒有後來的大傳學門。在兼顧大傳學術與新聞實務的目標下，「媒介研究」是一個相當適合作為大傳學門核心的概念。

#### 肆、口傳與大傳的「垂直」整合

確認了口傳與大傳的定位之後，接下來我們要回到兩者的整合問題。在傳播學門整合的趨勢下，口傳與大傳要如何既達成「統一」的目標，又能保有個別的言談與媒介等「獨立」傳統呢？在這方面，我們認為「口傳捨棄『口語』、大傳捨棄『大眾』，共同向『傳播』靠攏」的平行整合建議雖然達成了統一的目的，卻忽略了口傳與大傳原有的獨立特色與競爭利基。為了讓整合後的傳播學門能夠在統一中保持獨立，我們參酌了 Dance 與 Knapp 的人類傳播發展理論，提出了「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 的相容提議，希望為傳播學門的整合找到一個新的定位。

簡單地說，所謂的垂直整合，是依據人類傳播發展的時間軸線，將以言談為核心的口傳以及以媒介為核心的大傳作「時序的」(chronological) 的概念排列，兩者因此形成了「言談先、媒介後」的關係；而證據顯示，這種先後關係在本質上又是一種「言談體、媒介用」的關係，即人類傳播是以言談為本體，媒介則是這個人類傳播本體的延伸，甚至是言談關懷者在當代既重要且不可忽視的文化戰場。早期的廣

播、電影、電視等大眾媒介已藉由其迅速擴展的影響力凸顯了這個情況，現在諸如行動電話、數位相機、PDA 等各種傳播媒介，更深刻地展現了它們做為日常生活中言談的一部份。少了它們，言談的積極意涵也就容易被忽略。

接下來我們將從兩條人類傳播發展的軸線來論述言談與媒介的先後和體用關係。第一條是人類「整體」的傳播發展軸線，Dance 引用生物學的用語，將這條軸線稱為人類傳播的「種系發生」(phylogenesis)；第二條則是人類「個體」的傳播發展軸線，稱之為人類傳播的「個體發生」(ontogenesis)。這種種系發生與個體發生的觀點後來也被 Knapp (1989) 在《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中沿用。透過由這兩條時間軸線形成的架構，我們看見了口傳與大傳在概念上整合的可能。

### 一、從種系發生看口傳與大傳

種系發生在生物學中的本來意義指的是「一個物種或高等類目有機體的演進和歷史」<sup>(16)</sup>，因此，傳播的種系發生指的就是人類整體在傳播方面的演進和歷史，這是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的傳播發展軸線。一般所謂的「傳播史」或「人類傳播史」就是從種系發生的角度來看傳播的發展，雖然作者未必使用「種系發生」的名稱。

為傳播治史的常見做法是依其出現的年代，依序介紹人類各種不同傳播形式或媒介的起源與發展，例如 Schramm 在他的《人類傳播史》(The St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一書中便是如此。但也有學者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傳播的種系發生，例如聖路易大學哲學家 Ong (1967) 就相信人類的傳播發展歷經了三個階段，分別是人類只能言談而不懂書寫或印刷的「口語階段」(oral stage)、文字和印刷出現後的「書寫階段」(script stage)，以及廣播與電視等電子媒介出現後的「電子階段」(electronic stage)。與主張「媒介就是訊息」，認為媒介改變將造成訊息呈現方式改變的 McLuhan 頗為類似，Ong 相信隨著傳播的演進，人類

社會的文化或獲得知識的方式也將發生重大變遷。

無論是根據傳播史文獻或是 Ong 的觀點，人類「先言談、後媒介」的事實都是十分明顯的；人類是有話語，才有了後來的文字、印刷與廣播電視。而 Ong 相信，言談與媒介在人類傳播發展軸線上的先來後到可能顯示了言談的本質性，他說：「口頭表達不僅可以，而且在多數個案中都是在沒有任何書寫的狀況下存在的，但我們卻找不到有書寫而無口語的例子」（Ong, 1967：8）。換言之，沒有言談就沒有媒介，但言談卻可以在沒有媒介的狀況下存在，言談可說是提供了人類進一步運用媒介的可能。

更重要的，Ong (1967: 138) 指出，如果拿有言談的人類社群與既有言談也有媒介的社群相比，只有思想表達形式與效率的文化差異；但如果拿有言談與沒有言談的社群相比，則是有思想與無思想的重大差別，他表示：「在所有人類文化中，話語似乎是與完全發展的內部思維最為接近的感官對等物」，他相信「思想是植根在口語中的」。因為言談比媒介更能決定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因此言談是「體」，因為媒介決定了言談的形式，因此媒介是「用」。套用 Ong (1982: 21) 的話，媒介是言談的「衍生物」(derivatives)。

透過在人類整體傳播發展上的先後與體用關係，我們看見了言談與媒介——即口傳與大傳之間緊密的概念連貫性。我們相信，就傳播的種系發生而言，口傳與大傳雖然位處不同的樓層，卻可以適切地被垂直整合在同一棟傳播大樓裡。

## 二、從個體發生看口傳與大傳

個體發生在生物學中的原義是「個別機體從胚胎到成人的起源與發展」<sup>(17)</sup>；因此，所謂「人類傳播的個體發生」指的就是人類傳播在個別人類身上從胚胎到成人的起源與發展，這是一條人類個體傳播發展的時間軸線。一般所謂的「傳播發展」就是從個體發生的角度來看孩童傳播能力的成熟，雖然作者未必使用「個體發生」的名稱。

Dance 引用生物學「個體發生將重演種系發生」的觀點 (Dance & Larson, 1972)，主張人類傳播的個體發生也將重演種系發生。換言之，如果人類整體是依詢著「先口語、後書寫」，「先言談、後媒介」的傳播發展次序，那麼人類個體也將依此次序學習成長。

Dance (1982) 在他綜合了大量學術文獻所發表的「人類傳播的口語理論」(Speech The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中指出，正常人類個體自出生時就具備了「口說」(speech) 的能力，並誕生在一個「語言」(language) 的環境中，約在個體發展到 18 個月前後，這個先天的口語能力與後天的語言環境出現奇妙的結合，成為「口說語言」(spoken language)，至此人類等於是從「發聲」進入「言談」。Dance 相信，所有我們稱之為「媒介」的傳播型態，都是在「言談」的基礎上學習而來；一般而言，人類孩童是先學會說話，再學會運用說話以外的各種傳播媒介——包括文字、影像，以及各種整合展現、以致於帶來生活趣味的新科技，例如：電話、相機，和網路上的電子郵件等。

也由於孩童們大體上都是先學會言談再學習媒介，因此媒介等於是言談的延伸，在個體發展上，言談與媒介再次呈現了先後與體用關係，為口傳與大傳之間找到了概念連貫的可能。

### 三、口傳與大傳的對話

不過，以發展時間軸線為基礎的「垂直整合」模式雖然能替原本各自分立的口傳和大傳找到相互結合的概念依據，但光靠這樣是不夠的，口傳與大傳還應該透過言談與媒介的核心進行對話交流。我們建議，此種對話交流有四個主要方向，分別是 (1)「言談的媒介/媒介的言談」(talk media/media talk)；(2)「言談加媒介/媒介加言談」(talk plus media/media plus talk)、(3)「言談中媒介/媒介中言談」(talk in media/media in talk)，以及 (4)「言談後媒介/媒介後言談」(talk then media/media then talk)。表一就是針對這四個對話方向的具體內容及可能研究方向所作的整理。

表一：口傳與大傳的對話

對話方向	具體內容	說明	可能的研究方向
言談的媒介 媒介的言談	言談的媒介 talk media	擴大或延伸言談可 及範圍的媒介	研究行動電話的 功能及其對人際 關係的影響
	媒介的言談 media talk	媒介上進行的言談	研究廣電主持人的 語言風格或談 話節目的論辯品 質
言談加媒介 媒介加言談	言談加媒介 talk plus media	研究整合領域時，除 言談外，同時考量媒 介因素	傳播研究者除人 際影響外，還需 要兼顧媒介訊息
	媒介加言談 media plus talk	研究整合領域時，除 媒介外，同時考量言 談因素	傳播研究者除媒 介訊息設計外， 還需要兼顧人際 管道
言談中媒介 媒介中言談	言談中媒介 talk in media	在言談中探索媒介 進入言談以改變言 談的現象	探究文字或其他 媒介對口語社會 的語言或認知方 式造成何種改變
	媒介中言談 media in talk	媒介中的言談殘存 或言談邏輯	探究電視媒介中 展現的口語或言 談風格
言談後媒介 媒介後言談	言談後媒介 talk then media	探討言談如何影響 媒介使用	研究事前講授是 否能增進閱讀的 興趣與吸收效果
	媒介後言談 media then talk	探討媒介使用如何 影響言談	研究孩童的人際 溝通能力是否受 到網路使用的影 響

### (一) 言談的媒介/媒介的言談

言談與媒介的第一種對話方向是「言談的媒介/媒介的言談」。首先，「言談的媒介」(talk media) 指的是用以擴大或延伸言談可及範圍的媒介，例如人際言談中使用的行動電話、團體言談中使用的電訊會議、公共言談中使用的遠距教學等，都是屬於「言談的媒介」之具體案例。在口傳與大傳對話的觀念下，這些傳統上屬於「兩不管地帶」的媒介應該得到更大的重視。傳播學者可以對「哪些媒介延伸了言談的效力與範圍」、「言談媒介對於言談結果的影響是什麼」以及「言談媒介如何改變了言談的內容」等研究問題作深入探究。舉例來說，由知名大傳學者 DeFleur 與口傳學者 Kearney 及 Plax 合著的《傳播概論》(1993) 一書，便在討論媒介傳播時納入了有關電話發展 (大傳) 以及電話規範 (口傳) 的討論，極適合做為探討言談媒介問題的範例。

其次，「媒介的言談」(media talk) 指的則是在媒介上進行的言談。Ong (1982) 將廣播電視出現後的電子時期稱為「第二口語時期」，說明了言談在廣電時代的重要性獲得提升。因此，在廣播電視上呈現的各種言談都可以是「媒介的言談」所探討的範圍，包括「廣電主持人的語言風格為何」、「運動播報員是否使用特殊的技巧 (如公式) 來處理反覆出現的話題」以及「談話節目的論辯品質」等，都是這方面可以提出的研究問題。這類研究傳統上也屬「兩不管地帶」，因此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部分學校雖然設有「廣電播報」(announcing) 一類的課程，但偏重實務訓練，欠缺學術研究。相關研究在美國以外的傳播界反而比較常見，例如兩位英國學者以電視談話節目為題所做的論述分析 (Livingstone & Lunt, 1994)，便正視了媒介言談的特殊性。

### (二) 言談加媒介/媒介加言談

其次口傳與大傳可以在「言談加媒介/媒介加言談」的方向上進行交流，這是兩個學門間最早，也是最流行的一種對話型態。由於許多傳

播活動同時涉及到言談與媒介的過程，只看一個面向無法全面探究研究問題，研究者必須兼採口傳與大傳觀點。因此，這裡所謂的「言談加媒介」(talk plus media) 指的就是口傳學者在碰觸到整合性領域時，同時考量媒介的因素，參考大傳學者的理論與研究；而所謂的「媒介加言談」(media plus talk) 則正好相反，指的是大傳學者在研究整合性領域時，也不能忽略言談的因素。

傳播研究者 Rogers (2003) 在探討創新傳佈時，便指出任何訊息擴散的傳播現象，都得同時考慮大眾傳播與人際關係等不同層面的通道。而將傳播學中的政治傳播、健康傳播、公共關係等領域視為「整合性」研究的 Salwen & Stacks (1996)，也相信這些領域的探究，同時有助於口傳與大傳的理論與研究貢獻。此外，以研究「競選活動」的傳播學者為例，競選中同時牽涉到選舉廣告、選舉公關、耳語傳播、競選演講、電視辯論等因素，也必須同時考量言談與媒介的雙重面向。這些文獻同樣體現出「傳播」一詞實有其整體性，研究者不只應該多嘗試不同面向的研究，更應該在做任何研究時，都能以更寬廣的整體視野來理解傳播 (夏春祥，2003)，此處言談與媒介的互動關係所凸顯的也是這層意涵。

### (三) 言談中媒介/媒介中言談

口傳與大傳的第三類對話方式是「言談中媒介/媒介中言談」，這是直接來自垂直整合建議的交流方式。首先，「言談中媒介」(media in talk) 是根據 Ong 的觀點所發展出來的觀念。Ong (1967, 1982) 認為言談或口語雖然在廣播電視時代獲得新生，但這個「第二口語時期」(secondary orality) 已經與當初文字發明前，人們只懂口語而不懂書寫的「第一口語時期」(primary orality) 不一樣了。他相信在第二口語時期中，人們懂得運用書寫來協助口語。因此所謂「言談中媒介」就是要在今日的言談中，找到媒介進入言談以幫助言談的或傷害言談的現象。舉例來說，Ong (1967) 相信是文字的發明，使歷史可以主觀記憶成為客觀記錄，因此使「研究」歷史成為可能，這是文字媒介對言談的增進效用。



此外，根據 Ong (1982) 的說法，在新媒介出現後，舊媒介的傳播型態也會進入新媒介中，並轉化為新的型態呈現；不過他認為舊的傳播型態並不會因此消失，而是會殘存在新媒介中，因此我們可以在後來的媒介中找到先前言談的身影，他稱之為「口語殘存」(oral residue)。由此看來，「媒介中言談」(talk in media) 就是要在媒介中找尋言談的痕跡與潛在的影響。舉例來說，研究網際網路中對話模式的學者，早已發現網際對話中充斥著模擬口語的符號形式，這是口語殘存的典型例子 (Kiesler, 1997)。另外像電視媒介中的「口語邏輯」(oral logic)，也是研究電視的大傳學者相當關心的主題 (Fiske, 1991)。

#### (四) 言談後媒介/媒介後言談

最後，口傳與大傳也可以透過「言談後媒介/媒介後言談」來展開交流。首先，所謂的「言談後媒介」(talk then media) 是在探討言談——包括經由人際互動或是廣播電視學來的言談 (第二口語)，將如何影響書寫或其他媒介的使用偏好。在這方面，可能的研究問題有：「習慣電視上的第二口語文化後，個體隨後持續發展的讀寫能力發展是否將受到影響」、「人類先說話的事實將如何影響隨後的媒介選擇偏好」以及「如果先對課程內容加以討論，將如何影響隨後的閱讀行為」等。其次，「媒介後言談」(media then talk) 則在探討媒介的運用偏好如何影響人們的言談能力。「媒介後言談」的典型實例，就如同許多學者們的擔心與呼籲一樣，當我們的孩童在電視或電腦前面待的時間日趨延長時，他們與人溝通或與自己言談的能力可能將因而降低，甚至因為媒介內容直接引導了孩童們對於語言的認識與學習，造成不少社會問題。從 1998 年起的「關掉電視」<sup>(18)</sup>，台灣社會也開始注意到這些問題，並紛紛從「媒體識讀」或「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 的觀念上著手努力 (黃葳威，1997；吳翠珍，1998；陳世敏，2000)，甚至從社團組織的籌組開始 (馮建三，1999, 2001)，而這些都可說是意識到媒介巨大影響之後的具體實踐。

## 伍、結語

在傳播學門整合的大趨勢下，本文從為口傳與大傳找尋定位的角度出發，進而建議這兩個子學門的可能融合方向。我們建議，在打破原有的學科藩籬之後，口傳與大傳仍應各自保有「言談」和「媒介」的概念核心，並且根據種系發生與個體發生中先言談後媒介的時間軸線，以「垂直」的方式將兩者整合在一起，共組一個以「人類符號互動」(human symbolic interaction) 為研究主題的「傳播」或「人類傳播」學門。換言之，垂直整合是一個「統中有獨」的學科整合提議。

作者相信，比起「統中無獨」的平行整合提議，或是抗拒學門整合的「各自獨立」或「不統不獨」(維持現狀) 提議，「統中有獨」的垂直整合提議不僅符合學門整合的潮流，也更具包容口語傳播及大眾傳播傳統特色的能力，是各種學科未來發展建議中的最佳選擇。

我們相信，垂直整合後的傳播學門將更能解答 Powers 所提出的四項問題：

首先，在「界定」方面，傳播是一個以言談與媒介為核心，研究人類在言談與媒介中的符號互動過程的學門。

在「說明」方面，傳播是一個具有學術正當性的學門，因為根據言談和媒介的核心概念，無論或研究價值、概念深度、應用能力與學生就業方面都不難說明傳播學門存在的價值與利基。

在「包容」方面，傳播以言談與媒介為核心，可以將口傳及大傳多年來研究的多數現象都包含在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呈現」方面，透過垂直整合，無論是傳播學門內還是傳播學門外的人士將可了解：言談與媒介不是烏合的，種系發生與個體發生的時間軸線為言談與媒介提供了系統相關性與概念上的連貫性。

## 註釋

- (1) Dance 教授曾任美國國際傳播學會與全國傳播協會的雙料主席，是美國知名的傳播學者，他並曾於 2002 年 6 月應世新大學「蕭宗讓講座」之邀來台進行演講訪問。
- (2) 有趣的是，Knapp 教授也和 Dance 教授一樣，曾任美國兩大傳播學會的雙料主席，傳播學門歷史上只有三人曾享此殊榮。
- (3) Rogers (1994: 489-491) 在討論不同地區的傳播學發展時指出：與南歐相較，北歐各國的傳播學發展擁有制度性的支撐力量；而在拉丁美洲，墨西哥與巴西等國擁有極具力量的媒體產業，也因此傳播研究的發展極為蓬勃，建制的科系數量多到甚至得有政府介入、限制。而傳播學教育在台灣社會的發展情形，可參見翁秀琪 (2001) 與夏春祥 (2002)；在 2002 年，全台傳播相關系、所共 26 校 72 系所，與社會、心理、政治等科系相較，發展可謂昌盛。
- (4) Katz 在 1977 年於英國廣播協會發表演說時便指出：「傳播研究……很明確是個美國的學問 (an American science)。」請參考 Lang (1996) 關於傳播學歐洲根源的相關討論。
- (5) 這是 Schramm 在愛荷華大學時的貢獻，此時的新聞學院是一個偏向於傳播印刷領域的專業訓練單位。而這樣的大眾傳播博士訓練 (1947 年產生第一位博士)，與愛荷華大學內原先就存在的口傳方面的博士訓練 (1930 年便有第一位博士畢業) 同時並存，直接導致了今日傳播領域內大眾傳播與口語傳播等兩個分支的普遍情況。
- (6) 口語傳播當時已受注意，但是關注核心主要是在語言、修辭、演辯的傳統上。根據文獻記載，最早的新聞學課程出現於 1903 年的堪薩斯大學，次年 (1904)，Bleyer 開始在威斯康辛大學講授新聞誹謗法方面的課程 (Rogers, 1994: 18)。而深具傳統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則是在 1908 年成立。
- (7) Willard G. Bleyer 是教授新聞學的先驅者，他在 1912 年擔任威斯康

辛大學新聞系主任；此後，威斯康辛大學新聞學院成爲美國培養新聞專業人員的重要機構。Rogers 在討論美國傳播學發展時，爲闡明 Bleyer 及其學生們對於後來 Schramm 的觀點被接受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將他稱呼爲「老爸布萊爾」(Willard G. "Daddy" Bleyer)。他在書中的標題便是「Daddy Bleyer and the Bleyer Children」。

- (8) 將新聞學視爲是一門社會科學，是一種新聞學教育的觀點。與之區別的論述則是認爲新聞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職業，因此教育內容應著重在專業的取向，以訓練出熟悉實務工作的從業人員。
- (9) 這些學者有 Sam Stouffer、Ralph O. Nafziger、Rennis Likert、Jack Hilgard、George Gallup、Elmo Roper、Paul F. Lazarsfeld 與 Frank Stanton。
- (10) 請參見 Schramm (1994) 第一章「Wilbur Schramm 和傳播學的創立」，頁 8-18。
- (11) 綠色遮光罩人的由來，是因爲在早期的新聞實務流程中，報紙編輯必須配戴賽璐珞護目鏡，以便於在強光之下直接對新聞稿進行刪改。因此，綠色遮光罩人成了新聞教育中重視職業取向 (vocational) 和專業取向 (professional) 的象徵。
- (12) 「卡方」(Chi-Square) 是一個統計概念，用以檢視假設的被接受與否；這在後來的傳播研究中，曾一度成爲極具優勢的工具，所有的研究假設都需要在此基礎上得到驗證或被否認。在美國，這個詞被新聞實務出身的學者用來描述各新聞學院中受過正統學術訓練的學者們，而量化數據的客觀性，則是 1940 年代及其以後學術訓練的重要指標。在此之前，Lazarsfeld 同樣重視經驗素材的量化數據，但他並不接受這種檢定的概念；相關論點，請參見 Boudon(1993)。
- (13) 這些綠色遮光罩人嘲笑年輕的卡方人，認爲他們與培養未來的新聞記者毫無關連。也因爲對於新聞實務的重視，早些年想修習大眾傳播博士課程的必要前提是要有幾年的媒體經驗，這條件後來便被取消了 (可參見 Rogers,1994: 494)，但影響所及，連國內政治大學新

聞所博士班的創立初期也有著相同的信念：即入學者需要有媒介實務經驗，這樣的想法目前已不具強制的約束力，但仍存在於某些研究者與看法之中。

- (14) 他們同樣接受新聞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且理想的新聞教育內容，應該是四分之一的新聞課程，四分之三的社會、人文課程。然而，Bleyer 將重心放在大學層級的教育，其核心關懷仍在於訓練優秀的新聞從業人員，至於博士層級，他著墨不多，大體上，應是沿用新聞之名。但是，Schramm 很清楚地要訓練傳播學的博士，以致力於催生傳播學。也就是說，在 Bleyer 的觀念中，還沒有「傳播」這一字詞，但 Schramm 則力主開創一個傳播新領域。
- (15) 大學的學術管理者，多半是出身於傳統的學術環境。在這樣的脈絡裡，學者們要獲得認可，多半需要熟悉人文、社會學術的術語，也需要不斷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以取得普遍的認可。關於台灣社會的相關情形，可參見鄭瑞城 (1998) 與陳世敏 (2002a)。
- (16) 引自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電子版。
- (17) 引自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rd ed.)，電子版。
- (18) 請參見《中國時報》，1998年4月28日，「關掉電視才能救孩子！」的整版專題。

## 參考書目

- 吳翠珍 (1998)。〈解毒媒體——我們需要媒體素養教育〉，《人本教育札記》，111，17-20。
- 夏春祥 (2003)。〈觀念傳播：傳播整體性的再思考〉，中華傳播學會 2003 年新竹年會論文。
- 夏春祥 (2002)。〈眾聲喧嘩的迷思：關於傳播研究的筆記〉，《中華傳播學刊》，1，3-26。
- 翁秀琪 (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
- 馬成龍 (1999)。〈傳播學在美國的發展：從 SCA 易名為 NCA 談起〉，《新聞學研究》，58，245-256。
- 曹定人 (1980)。〈介紹 Speech Communication 這個學科〉，《新聞學研究》，54，151-158。
- 陳世敏 (2002a)。〈列車開走了〉，《傳播研究簡訊》，30，1-4。
- 陳世敏 (2002b)。〈提一個大問〉，《中華傳播學刊》，1，81-86。
- 陳世敏 (2000)。〈媒體素養通識課程規劃〉，《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1，16-21。
- 陳世敏 (1999)。〈導言：十字路口還是分水嶺〉，《新聞學研究》，58，241-244。
- 陳國明 (1999)。〈傳播學研究概觀〉，《新聞學研究》，58，257-268。
- 陳韜文 (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新聞學研究》，59，137-141。
- 馮建三 (1999 年 12 月 3 日)。〈電視大眾文化的受害者與參與者〉，《中國時報》，15。
- 馮建三 (2001)。〈成立公集團電視改革電影與電視〉，《文化視窗》，30，34-37。
- 黃鈴媚 (1999)。〈口語傳播在台灣的挑戰與回應〉，《新聞學研究》，59，143-153。
- 黃鈴媚 (1998)。〈推動口語傳播，捨我其誰？〉，《傳播研究簡訊》，16，16-17。

- 黃葳威 (1997)。〈現代人的媒體識讀能力〉，《新聞鏡》，458，32-36。
- 趙怡 (1988)。〈有聲勝無聲〉，金玉梅 (譯)，《說來自在：上台演講不緊張》，頁 I-III。台北：天下文化。
- 鄭瑞城 (1998)。〈大學教育與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4-6。
- Alexander, S. (1988). Awaiting the New Jerusalem. In *The chi-squares strike back: Academic research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not a threat. The Quill, January*, 30-34.
- Boudon, R. (1993). *Paul F Lazarsfeld on social research and its languag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arey, J. W.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Boston, MA: Unwin Hyman.
- Carey, J. W. (2000). Some personal notes on US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1), 12-22.
- Cartier, J. M. (1988). *Wilbur Schramm and the beginnings of Americ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 history of idea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 Chaffee, S. H. & Rogers, E. M. (1997).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In S. H. Chaffee & E. M. Rogers (Eds.),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pp.125-180). Thousand Oaks, CA: Sage.
- Chesebro, J. W. (1996, November). *Why we need to change our name to the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pectra, 32* (11), 2-22.
- Cohen, H. (1994). *The history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The emergence of a discipline, 1914-1945*. Annandale, VA: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Curran, J. (2002). Media and the making of British society, c. 1700-2000. *Media History, 8*(2), 135-154.
- Czitrom, D. J. (1982).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Dance, F. E. X. (1994). Hearing voices. In D. R. Vocate (Ed.), *Intrapersonal*

- communication: Different voices, different minds* (pp. 193-21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ance, F. E. X. (1989, March). Opposing a change. *Spectra*, 25 (3), 4-5.
- Dance, F. E. X. (1989). Ong's voice: "I," the oral intellect, you and we.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9, 185-198.
- Dance, F. E. X. (1982). A speech theory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 F. E. X. Dance (Ed.). *Human communication theory: Comparative essays* (pp. 120-146). New York: Harper & Row.
- Dance, F. E. X. (1980). Speech communication as a liberal arts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29, 328-331.
- Dance, F. E. X. (1972). The centrality of spoken word.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23, 197-201.
- Dance, F. E. X., & Larson, C. E. (1972). *Speech communication: Concepts and behavior*.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Dates, J. L. (2001). 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A time for assessment.).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6 (3), pp.21-23.
- DeFleur, M. L., Kearney, P., & Plax, T. G. (1993). *Fundamental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Mountain View, CA: Mayfield.
- Delia, J. G. (1987).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20-98). Newbury Park, CA: Sage.
- Fiske, J. (1991). *Television cultur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Jacobson, T. (2001). 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The disappearance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6(3), pp.19-21.
- Kibler, R. J., Barker, L. L. (Eds.). (1969). *Conceptual frontiers in speech-communication: Report of the New Orleans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instruc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Speech Association of America.
- Kiesler, S. (Ed.). (1997). *Culture of the internet*.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Knapp, M. (1989). Speech. In E. Barnouw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pp. 147-15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 K. (1996). The European roots. In E. E. Dennis & E. Wartella (Ed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Remembered History* (pp. 1-20).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Leff, M. C., & Procario, M. O. (1985). Rhetorical theory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 W. Benson (Ed.), *Speech communi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pp. 3-27).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Livingstone, S., & Lunt, P. (1994). *Talk on television: Audience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 debate*. London: Routledge.
- Lovell, R. (1987). Triumph of the chi-squares: It's a hollow victory. *The Quill, October*, 22-24.
- McQuail, D. (200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London: Sage.
- Membership changes name to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997). *Spectra*, 33 (5), 1.
- Miller, G. R. (1966). *Speech communication: Behavioral approach*. New York: Bobbs-Merrill.
- Nichols, R. C., & Stevens, L. A. (1957) *Are you listening?* New York: McGraw-Hill.
- O'Keefe, B. (1993). Against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75-82.
- O'Neill, J. M., & Weaver, A. T. (1933). *The elements of speech* (rev. ed.).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 O'Sullivan, T., Hartley, J., Saunders, D., Montgomery, M., & Fiske, J. (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 Ong, W. J. (1984).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Routledge.
- Ong, W. J. (1980).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our time*. *Journal of*

- Communication*, 30, 197-20.
- Ong, W. J. (1967). *The presence of the word: Some prolegomena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Park, R. (1922). *The immigrant press and its control*.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 Powers, J. H. (1995). On the intellectu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4, 191-222.
- Rarig, F. M., & Greaves, H. S. (1954). National speech organizations and speech education. In K. R. Wallace (Ed.), *History of speech education in America: Background studies* (pp. 490-517).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Rakow, L. F. (2001). Symposium: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hifting from industries to public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6(3), pp.11-14.
- Rogers, E. M. (1994). *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Rogers, E. M. (2003).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5th ed.). New York: Free Press.
- Salwen, M. B., & Stacks, D. W. (Ed.). (1996).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Schramm, W. (1997).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S. H. Chaffee & E. M. Rogers E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hepherd, G. J. (1993). Building a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83-91.
- Streeter, T. (1995). No respect! Disciplinary and media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introduc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 and against the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5, 117-129.
- Swanson, D. (1993). Fragmentation, the field, and the futur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 163-172.

- Tannen, D. (1996). *Gender & discour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oulmin, S. (1990).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ygotsky, L. S. (1987).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 S. Vygotsky: Vol. 1: Problems of general psychology* (R. W. Rieber & A. S. Carlton, Eds., N. Minick, Trans.). New York: Plenum.
- Watella, E. (1994). Challenge to the profess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43, 54-62.
- Work, W., & Jeffrey, R. C. (1989). *The past is prologue: A brief history*. Annandale, VA: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 Yu, T., Wu, Y., & Wood, R. V. (1994, November). *Improving public speak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LA.
- Zarefsky, D. (1995). On defining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In J. T. Wood & R. B. Gregg (Eds.), *Toward the 21st century: The future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pp. 103-112). Cresskill, NJ: Hampton.
- Zarefsky, D. (1993). What does speech communication mean? *Spectra*, 29 (4), 2-3.

**Rethinking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A Proposal to “Vertically” Integrate Speech and Mass Communication**

Tzu-hsiang Yu & Chun-Hsiang Hsi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rend started in the West, Chinese communication scholars have gradually reached consensus on integrat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SPC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MSCM) into a new disciplin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lthough they disagree about how the integration should be enacted. Rejecting the popular “horizontal integration” proposal, the authors follow the ideas originated by Dance and Knapp, suggesting to “vertically” integrate SPCM and MSCM along the lines of phylogenesis and ontogenesis of human communication, considering SPCM as the basis of MSCM, and MSCM as the extension of SPCM. The authors further propose that as a member of communication family, SPCM should take “talk,” including “public talk” and “private talk” as its core concepts. MSCM should take “media” as its core concept.

**Key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speech communication

---

\* Tzu-hsiang Yu is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Chun-hsiang Hsia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